

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奇迹

——甬籍音乐家群体重要特征管窥

沈浩杰

(宁波大学 艺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甬籍音乐家群体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多与上海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文化渊源, 奋发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 宽广的音乐专业覆盖与高超的业务水平, 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深厚的民族情感, 家庭多信奉基督教或有良好的音乐氛围, 与“宁波帮”的地域分布基本吻合, 是该群体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 甬籍音乐家群体; 特征; 近现代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 J6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2-0001-06

甬籍音乐家群体是宁波艺术人才群体的重要一支, 其组成可以上溯到南宋古琴家徐天民、元朝琴家袁桷, 以及明朝浙派古琴家徐洗、清代乐家姚燮等。囿于民国以前宁波乐人资料匮乏, 加上史料记录不详, 因此拙文研究的范围只限于20世纪初以来的100年。这是一个废止2000年封建帝制, 西方文化大量流入, 并与民族文化或相互融合或和谐共存的百年。其间, 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吸收的过程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正好处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风口浪尖上, 凭借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诸方面优势, 它最终成了中国接纳并消化西学最快的桥头堡之一。由此, 宁波先于中国很多地区发生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剧变的基础确立, 而甬籍音乐家群体主要特征的形成除了与宁波传统民风特点密不可分之外, 也与宁波在以上几方面表现出来的“海洋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群体从形成至今, 存在时间长, 业务水准高, 人数众多, 然而, 它的“宁波”印记却鲜为人知。因此, 作为一种人才文化现象, 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 该是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有益补充。

笔者通过对20世纪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甬

籍音乐家的人生轨迹、成长环境、专业成就及特点等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研究, 发现该群体主要存在以下特征:

一、多与上海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文化渊源

整个20世纪的中国, 无论在中国的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 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吸收消化西方文化,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发展方面, 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鉴于此, 上海滩聚集了多国、多元文化, 输入并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 而这些人才营造了上海特有的浓厚的文化氛围, 使上海成为各类文化人求生存发展的最佳之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各个文化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文化名人中, 多数都在上海留下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脚印, 多数都与上海有着或长或短的因缘”。^[1]

早在上海开埠以前, 宁波商人便携大量财物至上海滩, 此为宁波商帮的雏形。得益于甬沪间地理历史上的紧密联系, 以及该商帮在上海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宁波人在上海的文化地位也相对较高, 他们及其后裔大都接受了较好的文化教育, 并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接纳多元文化的滋养。他们接触了各类文化人, 特别是结识了有才学的西方人之后, 便能先于其他人领略包括音乐在内的西方文化, 并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上海这

收稿日期: 2010-06-06

基金项目: 宁波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0505)。

作者简介: 沈浩杰(1970-), 男, 浙江奉化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声乐与语言关系, 近现代音乐史。E-mail: shenhaojie@nbn.edu.cn

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下,宁波人凭借崇学、勤勉、善于开拓的特质,终于在西方文化习得方面走在国人前列。

西方正统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途径,除了教会之外,最主要的当属音乐院校,而中国第一个专业音乐院校是以1927年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建立为标志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先进的音乐人才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赵梅伯就是这样一位在上海求学,并以上海为舞台写下传奇人生的宁波(奉化)人。他于1921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商科,并以超凡的智慧和音乐才能,深得该校音乐系主任安德森博士等人的欣赏。他跟安德森博士学音乐,做助教,社会活动频繁,且都以音乐为主要内容,因此,音乐基础非常扎实。一战后,上海成为很多中外文化名人的避难之所,经安博士引见,赵梅伯还拜英国歌剧泰斗赫伯特·凯夫(Herbert Cave)为师,并通过自身努力,广交胡适等名流,虚心请教,这些都为他日后赴比利时留学和回国效力准备了必要条件,上海成了他辉煌音乐人生的起点站。

出生在上海的钢琴家吴乐懿自幼习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之后,得到钢琴系主任查哈罗夫教授和工部局乐队指挥(当时远东最好的交响乐队)梅·帕契的谆谆教诲,为其不凡的音乐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解放前夕,她实现了留法的愿望,归国后成了我国法国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钢琴界集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少数几个权威人物之一。

歌唱家葛朝祉教授家境优越,他自小学习钢琴、口琴,音乐天赋颇高,曾得上海声乐名师胡然的启蒙。进入上海国立音专之后,便师事赵梅伯。上个世纪50年代留学法国,师从世界声乐名师贝纳尔迪。留校任教后,便以27岁的低龄培养出蜚声中国乐坛的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之后又培养了陈敏庄、卞敬祖、黄英、王凯蔚、丁羔、葛毅等著名声乐教授和歌唱家,成为中国乐坛不可多得的一代声乐宗师。

著名钢琴家朱工一、周广仁均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学科核心人物,也是中国钢琴界的核心人物。从童年到青年时期,他们都在上海学习音乐,有过共同的老师——梅·帕契。由于工作关系,

朱、周二位先后被调至中央音乐学院,且教绩卓然,终于成为中国钢琴界的领军人物。

20世纪的上海,之所以在很长时期内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与我国几代最优秀的文化人士都曾经生活在上海,并在这里从事文化创作活动密切相关。当然,不光是国内文化人,欧洲一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家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因逃避政治迫害、或因对中国文化的向往等多种复杂原因流落到“孤岛”上海,如俄籍声乐教授苏石林、钢琴教授查哈罗夫、作曲家齐尔品等人,均以上海国立音专或工部局乐队为阵地,积极从事教学和表演活动,从而对上海的音乐文化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有意思的是,很多甬籍音乐家都与他们有着非常密切的师生或朋友关系。如吴乐懿师从查哈罗夫、梅·帕契,斯义桂也曾师事苏石林,赵梅伯、张贞黻、吴乐懿等则是少数几个与工部局乐队有过较多合作的中国艺术家。

二、奋发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

从明清时期到近代,外出创业已成为几代宁波人的人生抉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许多宁波人在上海站稳脚跟后,继而漂洋过海,前往日本、欧美及港台等地,或留学或创业,为宁波人在20世纪创下伟业奠定了基础。宁波商人如此,宁波音乐人亦然。

早期留学美国的应尚能,在攻读工科的同时迷恋着音乐专业,最后以工学和音乐双学位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第一位在美国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华人。回国后,他为我国音乐专业学校的初创和中国美声学派的建立四处奔走,刻苦钻研中西声乐艺术的科学融合,成为中国最早举办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之一,为我国声乐事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梅伯凭借过人的文化和音乐禀赋,考取了“中比庚子赔款”留学欧洲的资格,成为中国首位赴欧的声乐留学生,他坚持三次参加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公开考奖,终获头奖及爱尔乾奖学金,从而成为在欧洲最高音乐学府获此殊荣的华人,回国后随即被聘为国立上海音专声乐系主任,一生培养了30多位知名音乐教授。无论是西北音乐学院,北平艺专,还是香港音乐学院都

曾留下了他作为“拓荒者”的足迹。

周广仁是我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奖的钢琴家，她的业务扎实全面，涉及演奏、教学、作曲、音乐社会活动，且建树卓著。自任职中央音乐学院钢琴学科带头人以来，她主要考虑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钢琴流派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钢琴教育体系。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音乐院校钢琴主科教学研讨会”，会议统一了全国钢琴界对我国钢琴学科的历史、现状的思想认识，梳理和总结了事关我国钢琴教学发展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并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她尊崇赵沅院长有关重视社会音乐教育的建议，对钢琴在社会的普及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鉴于中国钢琴界缺乏专门期刊，贫于理论与艺术研究的事实，周广仁深知“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经过紧张的筹备，以钢琴理论与钢琴艺术研究为对象的综合刊物——《钢琴艺术》于1996年面世。她注重全国钢琴师资力量的平衡，但昭义便是她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培养的名师。为了能使中国钢琴早日加入国际钢琴比赛联盟，周广仁亲自主持庞大而又繁杂的筹备工作，于1994年9月，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在北京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从周广仁在钢琴领域创下的非凡业绩中，能够看出她“开拓”“进取”“务实”“全面”“大气”“仁义”和“责任”等众多特质。所以，她成了当今中国在国际乐坛上最具影响力和权威的钢琴演奏家、教育家，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女性之一，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的灵魂”，当前中国钢琴界公认的领袖。

为考证中国传统音乐中是否存在多声部形态，继而探求这种多声部音乐和声特性的源头问题，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教授深入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采风、走访、挖掘和整理工作，在综合学术界同仁和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终于出版了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开了音乐界对我国多声部民歌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先河。他以翔实的资料驳斥了中国无复音音乐的论点，“明确地排除所谓中国的多声部民歌是受西方宗教音乐影响而产生的这种‘外来说’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2]

综上所述，就音乐领域看，宁波人创造了近现代音乐史上三十几个国内第一，如此骄人的业绩，尚无出其右者。且不说赵梅伯、应尚能、周广仁创造的诸多第一，还有如制造中国第一架钢琴的林炳炎；第一个创办中国西洋乐器制造厂的张贞黻；第一个把柳琴带入世人耳目，并以此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王惠然；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世界声乐大赛中获大奖的胡晓平；第一个把国产钢琴品牌——海伦牌钢琴打入欧洲主流市场的陈海伦……，这些都是宁波人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格的生动体现，也是开拓创新的宁波精神在音乐艺术领域的集中反映。

三、宽广的音乐专业覆盖与高超的业务水平

专业涉及面广是甬籍音乐家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近50位甬籍音乐家的专业方向包括——作曲技术与理论、民族音乐理论、近现代音乐史、声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指挥、铜管乐、琵琶、柳琴、二胡、口琴、乐器制造修理、学校音乐教育等，同时还包括辞书编纂、社会音乐活动、音乐院校及团体的管理等重要领域，专业覆盖面之广令人惊叹。

除前文所述的几位名家之外，尚有作曲技术与理论领域的孙慎、陆仲任、施咏康、周大风、陆在易、樊祖荫，作词领域的晓星，提琴领域的张贞黻、俞丽拿、马友友，指挥领域的姚关荣、俞峰，铜管乐领域的朱起东，民族乐器教学、表演和改良领域的胡登跳、王惠然，民族音乐理论的江明惇、樊祖荫，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戴嘉枋，西洋乐器制造修理领域的张贞黻、林炳炎、陈海伦，音乐刊物出版与辞书编撰领域的孙慎、晓星、郑显全，学校与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领域的方堃、周广仁、周大风，音乐院校及团体管理领域的陆仲任、方堃、李名强、江明惇、樊祖荫、戴嘉枋、杨今豪等等，他们皆为现当代中国音乐界乃至世界乐坛声名显赫、业绩非凡的人物。

不仅如此，甬籍音乐家群体的专业触角还深入到各个专业方向的不同区域。以声乐专业为例，甬籍声乐家的声部分布较为全面，如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抒情男中音葛朝祉，戏剧男高音楼乾贵、葛毅，抒情女中音董爱琳，抒情女高音胡晓平，通俗歌手林忆莲、周冰倩等。

研究还发现,甬籍音乐家不但专业覆盖面广,而且还凭借勤奋和天资铸就了高超的业务水平。

就钢琴领域而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真正能称得上钢琴演奏家且教绩优秀的钢琴家为数不多。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国内公认的集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只在个位数,而其中宁波人却占了3位,他们是吴乐懿、朱工一、周广仁,足见宁波人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地位。

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1978年,马友友从哈佛大学毕业才两年便获得了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位最佳音乐家才能获得的埃弗里·菲舍尔奖,纽约东区46街改为“马友友路”,州长把每年2月9日定为“马友友日”。马友友共出版了50余张个人专辑,15次荣获“格莱美”大奖。他多次出席白宫宴会,在美国总统每次预留给华人艺术家的三个座位中,必居其一。2009年被邀出席奥巴马总统的就职仪式(同样被邀参加美国肯尼迪总统就职仪式的还有宁波籍歌唱家斯义桂),由此可见他在美享有的艺术成就及社会声誉之高。

朱工一是原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这位在履历表上没有任何大学学历记载,从未出过国的钢琴师,却培养出了众多钢琴名家,鲍蕙荞、吴迎、郭志鸿、诸大明、杨峻等皆出其门下,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钢琴教育家和演奏家,钢琴一代宗师。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评价说:“他对我国钢琴教学做出了巨大贡献。”^[1]

无论是“中国的夏里亚宾”斯义桂,“音乐诗人”陆在易,还是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俞丽拿……他们都和其他甬籍音乐家一样,都有着令人称道的高超的业务水平和不凡业绩。

由此可见,宁波人走出本埠,依托更为广阔的天地,努力开拓,最终造就了众多音乐领域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这一现象,完全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奇迹,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四、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深厚的民族情感

鸦片战争时期的黑水党、民国时期的上海四明公所等,都集中反映出宁波人深厚的民族情感和高度政治觉悟。这种性格同样体现在从事音乐工作的宁波人身上。

一直以来,甬籍音乐家在艺术上追求植根民族,洋为中用,以努力创建一套可以和西方相抗衡的民族音乐体系为己任;在政治上则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崇尚正义、追求进步,并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参与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这些音乐家中间,尽管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在爱国这一点上却高度一致。赵梅伯就曾婉拒汪伪政权邀其担任南京国立音乐院院长一职,冒死悄然携妻女越过日军封锁线,团结同样不满汪伪统治的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离沪进步师生,在西安创建了西北音乐学院。而应尚能则积极组建抗战宣传队,并负责领导一个合唱队,自己作曲,在汽车上装载一架钢琴,奔波于成渝公路沿线宣传抗日。

年轻时酷爱文学的孙慎,在吕骥等左翼音乐家的带领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进步作曲家;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打入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的集团军,为争取国民党内的抗日力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由他作曲的《救亡进行曲》是当时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抗日救亡歌曲,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宣传抗日的游行示威群众的斗争。

大提琴家张贞麒不满重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虽然工作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又重病缠身,但凭借其惊人的意志,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终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西洋乐器制造企业。

原中央音乐学院教务长、附中老校长方堃先生中学时,目睹同班女同学被日军飞机射杀的惨状之后,决心投身革命。中学时代,为躲避日军追杀,深夜带领十几位同学从嵊县往南转移,至丽水境内翻越浙赣边境,进入江西,前往重庆。考入西南联大后,方堃站在“一二·一”事件中被枪杀的同学灵前发誓:“不报此仇誓不姓胡。”(方堃原名胡积善,象山人,后因革命斗争需要改从母姓。)

词作家晓星,原人民音乐出版社《词刊》杂志首任主编、编审,革命战争年代参加新四军文艺宣传工作,多次上前线与日军拼杀,在一次突围中身上多处中弹,险些落入日军之手。他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创作的《钢铁部队进行曲》(刘炽作曲)、理论文章《我们应当提倡什么乐

风——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部门党员骨干学习会上的发言》《围绕音乐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场论战》和他的整个艺术生涯都体现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品质。

建立我国的美声体系是应尚能等甬籍老一辈声乐家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应尚能在他的声乐专著《以字行腔》中提到：“我感到我们中国人应该唱中国歌，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是中国老百姓，洋歌是他们所不能欣赏的，因为洋歌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十分遥远的距离。”^[4]这也正体现了应尚能一贯秉持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民族的艺术价值观。

赵梅伯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就立志把中国音乐介绍给世界，1932年，他第一次在欧洲试唱中国歌曲，竟大受听众欢迎。同年，他将中国音乐史及乐器、乐曲汇编整理成本法文《黄钟史》，引起欧洲音乐界对中国音乐的关注。1946年，受教育部之命，赵梅伯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其间，除致力发展西洋音乐外，更一心一意推动中国新音乐运动。他认为艺术虽不分国界，中国乐器可以演奏西洋音乐，但须保留中国乐器原有特色和音韵。中国人必须以中国人独到的体会，树立自己的国家风格。

江明惇之父江闻道与沈知白、姜椿芳等文化界名流过从甚密，在讨论是否送年幼的江明惇去前苏联学习音乐时，沈知白认为让小孩幼年出国，其将来的音乐作品就不会有太多的华夏民族血液，建议打消这个念头。江父便让江明惇随沈知白学习民族音乐，如今江明惇已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理论家。

五、家庭多信奉基督教或有良好的音乐氛围

20世纪初，西洋音乐流入中国，主要是以宗教为载体。宗教圣咏或西洋音乐的演奏成为传教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信仰基督的华人耳濡目染西洋音乐的机会最多，因而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人们信仰基督的过程，其实也是其宗教情感和艺术情感得到同步培养和积累的过程。上海，这个上世纪中国最早接纳西洋音乐的城市，便首先创造了让它的市民接触基督教，接触西洋音乐的机会。

老一辈歌唱家应尚能、赵梅伯及葛朝祉的父亲以及家族成员绝大部分笃信基督；楼乾贵则就

读于天津教会学校——培才小学，“每逢宗教节日参加排演圣经故事内容的演唱剧和歌唱课，对他童年及少年时期早已显露的对音乐的爱好及才能是很有影响的”。^[5]

老一辈钢琴家的吴乐懿、朱工一、周广仁，他们的家庭也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和基督教背景，吴乐懿的父亲是当时上海英商药行职员，母亲曾在浸会中学读书，有一定的钢琴基础。日后，妈妈便成了吴乐懿的启蒙老师，爸爸则竭力支持她学习钢琴。朱工一的父亲是一位医生，酷爱音乐，信奉基督。这种家庭背景使朱工一出生后便接受浸礼，成了一个基督徒。这也使他从小就对音乐艺术兴趣浓厚，并能背唱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主题。父亲发现他的天禀，便亲自向他教授音乐知识。周广仁曾提起他的祖父，说“他信奉道教中的乐善好施，相信基督耶稣的广大博爱，并且努力身体力行。我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广仁，即广大之仁与广仁大德……”^[6]

少壮派甬籍音乐家的代表胡晓平的歌唱才能早在童年时期就已显露，曾就读上海基督教景海女子师范的母亲非常喜欢音乐，经常举办家庭演唱会，这对胡晓平的歌唱人生起了奠基作用。然而让胡晓平下决心冲击世界声乐最高峰的，则是她亲戚，上海——巴黎联谊会主席、声乐教授汪淑芬女士对她的鼓励：“你将来肯定能成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歌唱家！”

甬籍音乐家家庭的西方宗教信仰背景正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宁波社会受西方文化强烈渗透的集中反映。因此，直接或间接的接受西方宗教熏染，或者沉浸在由它形成的西式文化氛围之中，成了多数甬籍音乐家接受西洋音乐启蒙，继而全面深入了解欧洲古典音乐、提高自身音乐修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和渠道。当然，信仰基督，或从感情上亲近西方宗教，对新生代甬籍音乐家来说，并非学习音乐的必经之路。

六、与“宁波帮”的地域分布基本吻合

“无宁不成市”之说在20世纪的中国商界流传甚广，以兴办实业为主的“宁波帮”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以及海外等广大地区多有分布，甬籍音乐家们的父辈、兄长或其他社会关系多为中小工商业者或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职员，他们拥有相对丰厚的资产，也有包括洋

人在内的旺盛的人脉,这就为音乐家从事音乐这个“花钱”的艺术事业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源。

当今许多著名甬籍音乐家出生、学习、工作的地域与宁波帮的分布地基本一致,如上海的葛朝祉、吴乐懿、李名强(周广仁、朱工一等后迁至北京),天津的楼乾贵(后至北京中央歌剧院工作,其兄长等家人尚在天津)、杨今豪,武汉的董爱琳(出生于武汉,学习出道在上海,后定居美国旧金山),广州的陆仲任,北京的孙慎等。就境外来看,当然还有香港的林忆莲、美国纽约的马友友(从法国巴黎随父母移居美国纽约)、旧金山的斯义桂等,这些地区既是华人聚居区,也是“宁波帮”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

由于甬籍音乐家研究资料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以上六点特征只是一种粗浅的概括与提

炼。我们认为对甬籍音乐家群体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参与。这项工作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将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宁波历史文化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陈鸣.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海派京剧宗师周信芳[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3.
- [2] 樊祖荫. 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论稿[M].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 5.
- [3] 葛德月. 朱工一钢琴教学论[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9: 前言.
- [4] 应尚能. 以字行腔[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4.
- [5] 易明. 绚丽、疏放、情深意长——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M]// 向延生.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 第3辑. 吉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587.
- [6] 梁想. 琴系中华——周广仁的艺术生涯[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5: 15.

Talented Musician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A Brief Account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Ningbo's Musicians

SHEN Hao-jie

(College of the Art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Ningbo's reproductive musician group is a very important force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usical history of China. It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music by its productivity, high quality and wide and lasting influence.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into this group from multi-angles in order to show the excell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n which Ningbo's musical talents develop, and the innate features of Ningbo's musical talents' group.

Keywords: Ningbo's musician group; feature;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usic

(责任编辑 张文鸯)